

从莎士比亚 到奥斯丁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

- 鲁宾斯坦 著
-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从莎士比亚 到奥斯丁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

鲁宾斯坦 著

陈安全 高 逾 曾丽明 编

陈安全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nette T. Rubinstein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本书根据 The Citadel Press · New York 1953 年版译出

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
〔美〕安妮特·T·鲁宾斯坦 著

陈安全 高逾 曾丽明 译

陈安全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9,000 册

书号：10188·531 定价：3.1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系美国文艺理论家安妮特·T·鲁宾斯坦所著《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第一部分，有重点地介绍和论述了从莎士比亚到简·奥斯丁约二百年间英国文学的历史。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在唯物史观点指导下撰写的一部英国文学史，论述确当，材料充实，很有参考价值。全书共约八十万字，计划分三册出版。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陈安全、高逾、曾丽明三位，陈安全审校定稿。

一九八六年七月

序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那些莎士比亚称之为“能从现在洞察未来”的伟大作家的传统。未来总是在现在的心脏底下搏动着。因此，最贴近时代心脏的人，也最能把握未来生活的脉搏。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也就是说，代表这一传统的作家，能透过生活表面的无数旋涡和逆流，看到永不止息的时代主流，并密切加以关注。

这种对历史基本方向的感知，这种对时代重大事件和潜在因素的深刻理解，同任何观察和再现历史细节的技巧没有多大关系。高傲自负的、或者易动感情的作家，如蒲伯(Pope)、萨克雷(Thackeray)、特罗洛普(Trollope)，以及耿直的、不满现实的作家，如左拉(Zola)、吉辛(Gissing)、莫里森(Morrison)，常常能逼真而动人地表现他们所观察到的人们的生活。但是，正如培根(Bacon)在另一个场合所说：“没有爱，人多不成伴，众多的面孔只不过是画像展览，彼此谈话只不过是饶钹玎珰。”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根植于使他们能敏感地了解同时代人之需要的爱，根植于他们对人的潜在力量的尊重。这种对人的力量的深刻信赖，这种对人的权利的热切关心，常常使作家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

现实主义作家们出于对当代事件的直接关心而写出的作品，却能与遥远的未来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有悖常理，其实也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洞察力。

这种似乎是未卜先知的洞察力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培根或赫胥黎(Huxley)式的大胆的、推理严密的科学预见，另一种是布莱克(Blake)或彭斯(Burns)式的同样大胆的、但不十分自觉的预言。在某些历史时期，作家把人能决定自己前途的基本信念，寓于当时普通的宗教神话之中，如班扬(Bunyan)就是。在另外一些时期，作家不得不创造自己的神话，如狄更斯(Dickens)就曾经隐晦地应用明白真实的情节。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往往同时也是充满强烈义愤的革命者，如弥尔顿(Milton)、黑兹利特(Hazlitt)、雪莱(Shelley)。享受革命后短期太平盛世的作家较为少见，如笛福(Defoe)、菲尔丁(Fielding)和简·奥斯丁(Jane Austen)。但是，伟大的作家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加当时的重大斗争。老矿工之歌唱道：“人们都说，在哈兰郡没有中立者。”在硕大的艺术世界里也是如此。

诚然，经院式的教条长期认为，艺术和政治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受艺术家和当时社会运动的关系所影响，不受他对人类需要的关心和他对未来进步的希望所影响。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艺术家自己也常常有这种观念。但是，艺术家脱离社会，无论是消沉还是反抗，都只不过是人的异化的一种特殊表现。人的异化是了不起的资产阶级时代末期的特征。

人类文化伟大时代的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总是带有政治性的，是属于一定党派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人是政治动物。当然，最富有人性的人——伟大的艺术家——就更带政

治性了。

本书准备简略地评述一下这种最了不起的时代之一——不断扩张的资产阶级世界充满希望的青春期和它的动乱不安但仍然富裕的成熟时期的时代。这里考察的二十多个主要人物，即使是最保守的学者和批评家也承认他们是他们的时代里最伟大的作家，并属于历代最伟大的作家之列。然而，通俗的传记和选集，或学究式的讨论，几乎总是缩小、歪曲或完全无视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而这些恰恰是受到他们赞扬的艺术作品的基础。因此，不管他们多么推崇这些作家的作品，却不可避免地要误解并歪曲这些作品的最主要成分。

全面考察英国文学史上这些主要人物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平和著作，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伟大的作家，在他们时代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中，是多么明朗地、自觉地、全心全意地始终站在进步的党派一边。但是，不是从事专门研究的读者，很难有时间和事实材料来做这种研究。而学文学的学生不问政治，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经院式的、脱离现实的传统观点。

本书可以说是出于一个研究者之手笔，她对于伟大的作家在人类不断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想要详尽地了解，然后简练而有说服力地教给别人。

本书首先简单扼要地介绍莎士比亚(Shakespeare)及其同时代作家的伟大作品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然后比较详细地探讨两个也许是伊丽莎白时代最重要的作家——莎士比亚本人和培根。^①

接下去的四章，每一章也同样首先简略地介绍时代背景，把重点放在该时期的历史中与文学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有关方面，

^① 因为培根的主要成就是在哲学方面，本书删去不译。

然后具体地讨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本书对所提供的材料不强求形式上的一致。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比较充分地介绍作家的生平；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探讨特定的作品则占了更大的篇幅。介绍一个作家的章节是长是短，并不相应地表示该作家的重要与否。内容决定形式。例如，济慈(Keats)只有不到六年写作生涯，二十六岁就死了，这一悲剧性的事实，使我们介绍他的生平和著作，只用黑兹利特、狄更斯或肖伯纳(Shaw)所占篇幅的一半还不到。

在许多地方，我对作家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态度所作的结论，免不了和传统看法相反，所以我认为最好是尽可能多地直接引用原文，作为无懈可击的证据。因此，除了莎士比亚那一章以外，每章都有大量引文，有引自较审慎的文学作品的，也有引自私人信件和日记的。即使在莎士比亚那一章，也援引了大量或多或少为大家所熟悉的他同时代人所写的文字。我相信，任何人，不论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只要公正地考虑这些伟大作家本人的言论，就会得出结论：作家们自己也全都感到，“谁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谁就不得其门而入。”

最后一点，虽然本书所叙述的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全书的五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阅读。实际上，不太熟悉英国早期历史和文学的读者，不妨先读第三部分（它探讨的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近代世界），然后再回过头来读伊丽莎白时代，可能更恰当些。

对于那些已是“时时在思考真正伟大的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本书可能对他们所熟悉的艺术珍品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展示出许多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热爱的文学大师的著名生平的另一侧面。对于那些已深深介入我们这动荡困难时

代的政治生活的人们，我想，本书将给他们带来新的伙伴，提供新的力量源泉。这至少是在我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努力，现在怀着热情完成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时所希望的。

安妮特·T·鲁宾斯坦

一九五三年九月，纽约

目 次

| | |
|------------------------|-----|
| 序..... | 1 |
| 伊丽莎白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 | 1 |
| 伊丽莎白时代..... | 3 |
| 威廉·莎士比亚..... | 26 |
| 清教徒和骑士党..... | 111 |
| 约翰·弥尔顿..... | 125 |
| 王政复辟时期..... | 183 |
| 约翰·班扬..... | 193 |
| 理性时代..... | 239 |
| 奥古斯都时期的作家..... | 241 |
| 约拿旦·斯威夫特..... | 267 |
| 丹尼尔·笛福..... | 303 |
| 亨利·菲尔丁..... | 351 |
| 从奥古斯都时期的作家到浪漫主义作家..... | 389 |
| 简·奥斯丁..... | 409 |

伊丽莎白时代和 资产阶级革命

在英格兰大地上，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今天盛行的是这样一些事物：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向新人文主义之花。它在意大利和德国表现得最盛，在英国却相形未足。到了六世纪，英国，特别是亨利八世，才尽情地享受到文艺复兴的果实。但是，英国的文艺复兴有不同的是非形式。这一部分是因为下面简略叙述的某些政治事件：群众性的事件所造成多少带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而淡化了。部分是由于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强大潮流。这个运动对英国的影响几乎不逊于对荷兰的影响。在运动的鼓舞下，出现了运动领袖，威克理夫（John Wyclif）、威廉·特代尔（William Tyndale）和休·拉蒂默（Hugh Latimer）。新任的教皇伊恩·本尼迪克特（Innocent VII）和新任的总主教托马斯·坎特伯雷（Thomas Cranmer）都是虔诚的改革派。

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从一个方面看，那么，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从另一个方面看，那么，它们又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而且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殊外相白蓮母
命革退倒玄資

伊丽莎白时代

在英国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迎来了近代世界的、成功的革命的早期，其真情实况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今天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文艺复兴是世俗学问的人文主义之花，它在意大利和法国来得早一些，在英国却姗姗来迟。到十六世纪，英国，特别是京城伦敦，才尽情地享受到文艺复兴的果实。但是，英国的文艺复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部分是因为下面简略叙述的某些政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多少带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强烈感情，部分是因为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强大潮流，这个运动对英国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对荷兰的影响。在运动的鼓舞下，出现了诸如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和休·拉蒂默(Hugh Latimer)等殉教的新教领袖人物。正如优秀的法国批评家埃米尔·勒格维(Emile Legouis)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所说的：

在法国，文艺复兴主要是贵族的事情，而在英国，文艺复兴始终和人民大众密切相关，它保存并促进了民谣的流行。剧场是演出当时最辉煌作品的地方，人人都可以去看，它对卑微的平民和达官贵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英国的文艺复兴重新注重学问，并且和古老的大众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突出地表现在十六世纪初中世纪道德剧的发展（相反地，在法国，这种繁荣一时的中世纪民间艺术在文艺复兴中完全销声匿迹了。一五四八年以后，其他中世纪宗教剧、神秘剧的公开演出也为法律所禁止）。

最早的这种新的英国道德剧之一是约翰·斯克尔顿（John Skelton）在一五一六年写的。斯克尔顿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拉丁语学家和语法学家著称，并被任命为未来的亨利八世的私人教师。他摒弃了宫廷语言和大学语言，以当时还不受尊重的英语方言写诗。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名著《乌托邦》是一五一六年用拉丁文写的，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但直到一五五一年才译成英语。而斯克尔顿却写道：

尽管我的诗蹩脚，

七零八落不整齐；

风吹雨打太阳晒，

锈蚀虫蛀褪了色；

但你若是有心人，

韵味还是有几分。

他的道德剧《宏伟》，不是表现中世纪那种天堂与地狱之间争夺人的灵魂的斗争，而是表现一个国王身分的文艺复兴英雄“宏伟”差点毁于听信奸佞之言，但是在“希望”、“谨慎”和“坚持”等好人（他们同样是尘世凡人）的帮助下得到解救。

更加有意思的是，发表在三年以后，为适应世俗需要，而由

古老的宗教剧形式改写成的《四大要素》(作者没有署名)。作品中的魔鬼是“无知”，英雄是“人性”，“人性”是“大自然”的儿子，他被他的保护人“求知欲”拯救出来。

四十年代末，演出了《智慧和科学》，在这出戏中，一个名叫“理智”的贵族父亲，想把他的女儿“科学”嫁给贫穷、出身卑微的“人类智慧”——“自然”的儿子。对于那些认为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的观点，他这样回答：

所以，既然他们俩如此匹配，
相亲相爱，纵有人说三道四，
管它干啥！科学自有足够的本领
养活他们两口子。

在这出戏中，也有一个恶棍，是“懒惰”所生的“无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种文学形式开始出现，它深深地影响了发展中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

一五四八年，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他的《编年史》，该书记载兰开斯特封建集团和约克封建集团之间的内战(玫瑰战争)，以及亨利七世、八世统治时期的历史。我们就要讨论的莎士比亚的两组宏大的历史剧，从这些十分流行的编年史中汲取了不少素材。

一五六一年又出版了一部《英国历史概要》，该书在半个世纪中再版了十一次。

一五七八年到一五八六年间，出版了拉斐尔·霍林谢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深切关心政治事件、渴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公众，热烈欢迎这部书。莎士比亚从此书中

也得益非浅。

接着，在伊丽莎白时代没有布景的舞台上演出了十分动人的心弦的历史剧。不识字的人，纷纷争相观看。

一五五八年伊丽莎白即位时，挣脱了封建桎梏而获得自由的陶醉，英国到处展现在新兴的年轻资产阶级面前的新境界和新前景所引起的激动，已经成了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时代气息。

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伊丽莎白的祖父亨利七世，以他的胜利结束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自相残杀的“玫瑰战争”，封建贵族基本上被消灭了。因为亨利七世需要支持，惟恐旧贵族中残余的敌对力量死灰复燃，所以他的都铎王朝一开始便和“中产阶级”新兴的不断成长的力量和财富结成紧密的联盟。他的政策自然地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并且在许多方面满足了资产阶级中最先进阶层的需要，在思想上和他们取得一致。

举个例说，亨利七世一毛不拔，却破例愿意动用国库，以奖金鼓励造船业。早在那时候的一个世纪之前，杰弗利·乔叟(Geoffrey Chaucer)就已经注意到，在前往坎特伯雷进香朝圣的所有香客之中，只有发迹中的“新人”——活跃的资产阶级商人——关心英国的海上力量受忽视的问题。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在英国抗击欧洲反动势力之中心西班牙的过程中，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逐渐倾向于反对天主教的中世纪势力。由于获得极为普遍的支持，而且实际上没有遭到内部的反对，他成功地使英国独立于超越国家界限的封建权威之外，这种权威到当时为止几乎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挑战。

亨利八世通过没收大片大片的教会庄园，并立即零碎转卖，

大大地加强了新有产者的力量，使这些原来的商人同时又成了地主；大大地刺激了贸易发展；加速了新贵族的形成。新贵族来源于资产阶级，其阶级利益使得他们忠于皇室，这在当时也就是意味着忠于国家统一的原则。

一五四七年亨利八世去世时，商业已有很大发展。据记载，伦敦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增长了四倍。受命以其幼儿的名义行使统治的贵族摄政院，在其全部十六个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头衔是早在该世纪之初就有的！

资产阶级取代了封建贵族，这其中所包含的实际的进步因素，我们今天是很容易忽视的。

但是，应当记住，我们把伊丽莎白时代说成一个革命的时代，这革命并不是指极度贫困的农民的革命，也不是指被早期资本主义农业赶离土地、数目大得惊人、处境更加悲惨的“身强力壮的流浪汉”——未来的工匠——的革命。

正如巴罗斯·邓纳姆(Barrows Dunham)在他的深刻而机智的著作《锁链中的巨人》中提醒我们的：“封建主义垮台了……不是被它直接剥削的阶级所推翻，而是被另一个仅仅受到了它妨碍的阶级所推翻的。”这另一个阶级当然就是指人数不多、然而迅速增长的资产阶级——有些是熟练的工匠，有些是造船工人，有些是专业人员，最主要的是商人。

在许多方面，这个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比人们期待于该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提出的还要进步。

因为，正如我们美国革命的历史和法国革命史已经充分表明的，当这样的中产阶级开始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发展的自由而斗争时，最初总是把自身的问题说成似乎包括一切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自由。一旦这个广泛的纲领的实现成为有实际可能时，